

## 寻找纤维之下的文明

□肖浩



《文明的经纬:纺织品如何塑造世界》  
[美]弗吉尼亚·波斯特雷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4月

人类从原始社会的一片树叶到由针织物汇聚成的文明,纺织品的发展也是文明的发展。从埃及的羊毛到中国的丝绸,美国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弗吉尼亚·波斯特雷尔在她的著作《文明的经纬:纺织品如何塑造世界》中精妙地述说了布匹贸易如何塑造古代社会,纺织业如何推动社会革新。

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块由金线织成的蒙古织物,这件织物将伊朗狮子鹰首兽的图案和中国祥云的图案结合在一起,狮子的翅膀上就是中国的祥云。深棕色的丝绸上金线把金属固定在纸质底面上,再缝合织出图案,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针织技术。而织这块图案用到的另一种被称为“彩花细锦缎”的织法,则起源于伊朗。

这种融合交流,让短期内,中国、中东、马穆鲁克和卢卡的丝绸都出现了这种国际化的装饰风格。但是在文化交融的背后,是蒙古人通过对纺织品的垄断从而展示绝对的强权,蒙古人劫掠城市,但格外重视工匠,比如他们横扫阿富汗赫拉特城后,将一千多名懂得金线针织的织布工,转移到现在新疆地区。而打下撒马尔罕后,蒙古人将来自撒马尔罕的织布工运送到现北京附近的洗马林,将中国的织布工移到了撒马尔罕。这样野蛮生硬的迁徙,只为了供给统治阶级足够的针织品,那些各国的工匠被迁走被“圈养”着,蒙古统治者将本土产品与舶来品混用,在蒙古包帐篷中,外墙是白色的传

统毛毡,而内衬则是被征服的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纺织品,这种混合彰显了蒙古作为征服者的荣誉。

蒙古的统治之后,元末农民起义让朱元璋脱颖而出,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在推翻蒙古人统治扫平其他竞争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他理想中的“传统秩序”。他开始制定上到皇帝下到百姓的服饰规范,用纺织品为社会等级制定标准,将贵族与平民区分开,将官员的等级区分开,将老百姓按照儒家等级制度区分开。比如平民禁止穿着丝绸、缎纹或锦缎。虽然洪武十四年(1381年),出于皇帝对农民的好感,放宽了对农民的服装限制,允许农民穿着丝绸、纱罗和锦布。但如果这个农民家庭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那就必须按照商人这一档来穿着,不可能穿丝绸等高级布料。通过对穿着的规定,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并且塑造明朝的道德基础。

在明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里,这些服饰规定基本上没变,但人们对于这套制度的敬畏也随着朱元璋的死去,以及时间越来越久被人们逐渐遗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业的发展,违反服装规定的行为也在增加,富有的平民开始穿着贵族阶层的面料与款式,贵族阶层则追求着更为高端奢侈的纺织品或者纺织技法。

在日本,明朝与同时期的江户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川幕府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受到儒家思想启发的等级制度,并制定了与之匹配的规定,但

这些法律不断遭到蔑视,并且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削弱了其权威性。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城市工匠和商人被归类为地位低下的“町人”,当他们富有后并没有模仿所谓的上层阶级,而是发明了新的装饰图案与穿戴方式,规避了限制,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品位。法律禁止他们使用扎染出的图案,他们就手绘丝绸。不被允许穿着鲜艳的颜色,他们就保持最外层衣服的朴素,而将奢华的衣服藏在内衬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粹”的审美品位,将美浓缩在细节中,避开了阶级的制约。

在朱元璋的同时代,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意大利诸商业共和国也开始对纺织品、服装和装饰采取限制。从1300年到1500年,意大利城邦颁布了300多条不同的禁奢法令。比如帕多瓦限制妇女只能拥有两条丝绸连衣裙,博洛尼亚对佩戴镀金银纽扣的人罚款,威尼斯禁止法国时装,佛罗伦萨规定死者下葬时所穿的衣服只能是内衬亚麻布的素色衣服。

纺织品本身并没有价值,而人类不同文明赋予了纺织品与其文明相匹配的价值,这才让纺织品生出了经济、权力、道德、时尚等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体验。作者从一根纤维开始讲起,在全球的视角下,看看纺织品如何深入各种文明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的。

## 我们在怎样的“世界”谈论中国文学?

□顾奕俊



《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  
傅小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

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界去”俨然是当代中国社会与当代中国文学共通的显豁主题。“到世界去”是一种明晰的价值选择,也是一种驳杂的文化想象,而同时只有厘清“世界”与“世界文学”的结构关系,我们才能明确中国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傅小平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探索。

傅小平是业界极具盛名的文化媒体人,也是一位视野开阔、功力深厚的文学批评家。尽管傅小平在该书“自序”颇为谦虚地将自己所述文章定位于对作家的“刻绘”,但观照全书目录所涉“海外篇”“渡海篇”“海内篇”三部分,傅小平实则有着建构生长性、开放性的文学整体观的宏愿。

还是在《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的“自序”中,傅小平提及百年以降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异常微妙的缠绕关系:“如果说,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新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读者正是在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学习中获得了世界性视野。”循于此,傅小平专设一辑聚焦当代中国的翻译大家。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使傅小平回顾译者生平及相关交往片段时,敏锐而生动地捕捉到其人其“形”,但《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的所思之处不局限于此,因傅小平是要以人物之“形”意在勾勒一个时代的文学气象。在傅小平看来,作家的“小传”是

一条隐伏的线索,其背后延展开去的还包括文学生产、文学制度、文学经典化等命题,是特定阶段的“文学遗产”与“文学债务”在我们身处时代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共振。比如借由傅雷的文学翻译所生发的“影响的焦虑”;比如对于许渊冲的翻译“转化”过程的阐发;比如以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作品为引,探讨翻译文学对国内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高谈阔论”很明显并非傅小平完成这部《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的特质,他更愿意去昭示那些曾经心有戚戚的“阅读的细部”“现实的细部”与“人的细部”,而傅小平对于“世界性的文学”与“世界性的文学视野”的态度立场也由之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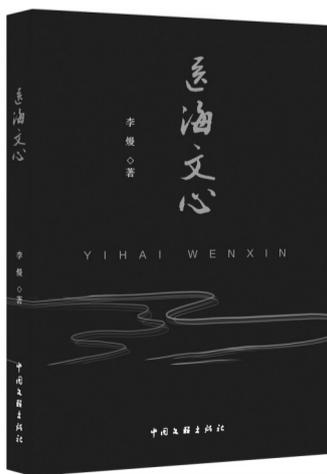
而傅小平关于“世界性的文学”“世界性的文学视野”的有意识张扬,其最终落位依旧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被看见”,包括如何“被看到”“被看到”了什么?而傅小平的观察对象除了文学创作者,也涵盖陈平原、戴锦华、王尧、毛尖等学者、评论者。不同界域的观察者在此完成跨时空的对话抑或是争鸣。傅小平并没有抑制“众声喧哗”的发生,相反,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众声喧哗”当中,试图找寻到指涉中国文学的开阔视角与清晰线索,他在分析戴锦华时便内嵌了相似的自我要求:“事实上,我们正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以戴锦华的观察,无论是理论、文化、话语,还是文学、艺术、

电影,她都觉得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去正视、去回答。我们还没有认出来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逻辑、价值逻辑,这个逻辑不仅要是中国独有的,还必须是具有人类价值的。”在“不一样的世界”去确立“这样的方式”,也是傅小平借助《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的纷繁文学“碎片”所试图达成的终极目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及其经验嬗变,在傅小平看似漫不经心的走笔之间,形成了饶有深意的整体架构与未来投射。

《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涉及国内外不同流派风格、趣味意旨的作家、学者、译者,但其最终抵达的核心命题依旧是相关个体或群体如何用文学表达自我与世界,以及人如何通过文学获得自我与外部世界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就这个角度而言,当我们以“世界”与“世界文学”为参照坐标去反照当代中国文学,并非仅仅是指明其间的差异,而是文学是怎样贯穿“域内”与“域外”的壁垒,构成一种想象彼此,且深刻影响彼此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虚的指向与虚的营造,但“虚”的纵深处是关系着真切的生活状态、情感经验的互通,是一类“自我”对于另一类“自我”的碰触。而傅小平所做的,是让那些被遗忘的时空与人事重现,借此提醒我们“人”与“世界”的丰盛与宽广。

## 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

□鲍风



《医海文心》  
李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4年4月

李嫒在澳大利亚访学时,为了记录下自己的学习与生活,为了记录下对家人与师友的思念,也是在文学笔友的鼓励下,坚持写博客。这唤醒了她沉睡已久的文学梦。之所以说是“唤醒”,是因为李嫒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只是后来选择了医学专业,后来又留校任教,读书时学业繁重,留校做老师后教学与科研繁重,这让她不能不暂时把“文学梦”搁置起来。“文学梦”也就渐渐沉睡下去。但写作的念头,希望成为作家的念头,时时袭来,这让李嫒一次次停下医学论文写作,一次次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下一篇篇记录着心灵之旅、生活之旅的散文。如今,李嫒从自己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一部分集结成册,这便有了散文集《医海文心》的出版。

在《医海文心》所收42篇散文中,李嫒记录了自己的童年追求、求学过程,以及海外生活学习经历,还有自己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的生动细节。从这些散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人生的热爱,感受到作者对事业的执着,感受到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那份热忱。应该说,《医海文心》是李嫒生活史的生动记录。

“真”是收在《医海文心》的散文给人的最为突出的印象。这里的“真”,不仅是“事”真,更重要的是“情”真。无论是《梦回童年》《我们的浪漫》,还是《我

和老外同事相处的几大秘诀》《海外游子的中国胃》,还是《秋天的收获》《爱心衣橱送新衣》,都是李嫒人生的真实记录。李嫒为了圆文学梦,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为了能更多地读到自己心仪的小说散文,为办一张市图书馆借阅读,李嫒曾多方求助;作为一个学医者,李嫒为了救治病患忙前忙后,为上好几节课,李嫒总是挑灯夜战,不知疲倦;为了给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孩子送去图书和衣服,李嫒几经周折,翻山越岭,数次累病;每一篇散文,都有作者自己的身影,每一篇散文,都是李嫒自己生活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李嫒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记录自己参加公益事业的过程,并非是一种“零情感”式记录,而是充满激情与热烈,火热的情绪感染,渗透在散文的字里行间。这让李嫒的散文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使其散文有一种强大的“带入感”,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散文中流露的真情感染、打动。

“叙事性”是李嫒散文的另一个特点。读李嫒的散文,很少看到其对景物的工笔描写,更少领受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散文通过快节奏的叙事,将作者的情绪体验融入其中,让读者在散文的叙事中,体会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事业的追求。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叙事性,李嫒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活实感。

因为其“真”,因为其“叙事性”,让收在《医海文心》里的散文从整体看,呈现出一种“自叙传”的特点。作者在这些散文里,除了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外,也记录了自己人生每一个成长节点的所思所想,记录了自己对人生、对事业、对亲情、对社会公益事业等认识的每一次提高,所以我们同样有理由把这本散文集当做作者的精神成长史来阅读。

李嫒在《医海文心》的《自序》里说:“医学是我的使命,文学是我的爱好。”我一直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医者总怀一颗“文学的心”?我们熟知的鲁迅、郭沫若、渡边淳一、毛姆、契诃夫,还有济慈、柯南·道尔,还有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毕淑敏,以及冯唐,等等,无不是学医出身,他们有的甚至在写作之前从医多年,有的甚至边写小说边从医,他们是不是在学医的过程中,希望通过文学审美,让自己的职业变得温润一点,或者,他们在学医后见到患者面对疾病的无助,更希望有机会通过文学写作,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有所思考?

作为一位大学医学教授,作为一个文学逐梦人,作为一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余,在繁忙的社会公益活动之隙,勤于笔耕,忘情文学,应该说,是李嫒之幸,亦是文学之幸。